

马来西亚史里肯邦安(沙登)客家新村现状调查

Investigation on the Status Quo of Seri Kembangan Hakka New Village in Malaysia

马 瑛

(MA Ying)

潘碧丝*

(FAN Pik Shy)

摘要

新村是马来西亚华人聚居的村落，指在1948年至1960年紧急法令时期所成立的乡区居民移植集中地区。1948年6月18日英国殖民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1949年5月28日颁布《毕利斯计划》，将所有乡村及附近华人移居到集中地区统一管理。目前马来西亚共有436个传统华人新村，其中客家新村为数不少，而客家族群属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五大方言群之一，占了马来西亚华人人口23.5%。史里肯邦安(沙登)新村是雪兰莪州最大的新村，也是全马第二大新村，客家第一大新村，客家人口占70%以上。面积834公顷，约2,000间住户，新村内人口约20,000人。本文结合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从区域及新村概况、居住形式与房屋、社会组织与教育、信仰风俗与饮食四个方面梳理史里肯邦安(沙登)新村的现状与特征，为马来西亚客家新村及华人族群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史里肯邦安(沙登)新村、客家、现状、调查

Abstract

New villages are Chinese settlements in Malaysia. They were established to resettle the widely dispersed Chinese inhabitants in the rural areas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from 1948 to 1960. On 18 June 1948,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Malaya was in a state of emergency. On 28 May 1949, the Briggs Plan was enacted to move the Chinese to centralized areas for unified management purpose. At present, there are 436 traditional Chinese new villages in Malaysia and many of them are Hakka new villages. The Hakka is one of the five Chinese major dialect groups in Malaysian, accounting for 23.5%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population. The Seri Kembangan New Village is the largest in Selangor and the second largest in Malaysia. More than 70% of its population are Hakka and it is the largest Hakka new village. The area is 834 hectares, with about 2,000 households and a population of about 20,000. By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ri Kembangan New Village through four aspects: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region and the new village, form of residences and housing,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education, as well as

* 马 瑛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电邮地址：maying1201@gmail.com；
潘碧丝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讲师，电邮地址：fanpikshy@um.edu.my。

belief customs and diet. The ultimat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Hakka and Chinese ethnic groups in Malaysia.

Keywords: Seri Kembangan New Village, Hakka, Status Quo, Investigation

一、前言

新村是马来西亚华人聚居的村落，根据马来西亚政府对新村的定义，是指那些在1948年至1960年紧急法令时期所成立的乡区居民移植集中地区。1948年6月18日英国殖民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1949年5月28日颁布《毕利斯计划》（The Briggs Plan），将所有的乡村及附近的华人移居到一个集中地区统一管理。（马华公会新村事务局1999：39）1954年新村数量为439个，1970年465个，1980年起房屋与地方政府部门资料显示新村数量为452个，至2002年减为450个。（林廷辉，方天养2005：48）2019年，隶属房屋与地方政府部的新村发展部最新数据发布新村数量为613个，将传统新村（436个）、渔村（43个）和重组村（134个）一起纳入新村管理。¹早期的华人新村多为木屋区，目前许多木屋已翻新成现代建筑，也有一些新村因人口外移、房屋废弃而逐渐变得破旧不堪。根据新村的地理位置，可分为A类市区边缘新村、B类半城镇周边新村、C类乡区新村。（马华公会新村事务局1999：31）分类不同，新村的经济结构及村民职业存在着显著差异。总体来说，新村建立之初，村民的生活主要依赖胶园、矿场、农耕、畜牧、渔业、经营传统家庭式生意、建筑业等，随着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及国家城市化发展，新村村民的生活方式与职业随之转变，新村附近的耕地、胶园和矿场逐渐转为商业及住宅用途，乡区新村的村民大多选择离开新村外出打工；市区边缘新村已很少有农业活动，大都以城市工商业为主；半城镇周边新村则农业、渔业、畜牧业及工商业兼而有之。目前马来西亚人口最多和土地面积最广的新村是位于吉隆坡的增江新村，史里肯邦安（沙登）新村位居第二，属A类市区边缘新村，下文简称沙登新村。以下为历年来的新村数目：

表1：新村数目

1954*	1970	1985	2002	2019**
439	465	452	450	432

资料来源：林廷辉、方天养，2005，《马来西亚新村：迈向新旅程》，吉隆坡：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页49；
 *CORRY,W.C.S.1954, *A General survey of new village :A report to his excellent sir Danald McGillivray, high commissioner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inters, by G.A.Smith).[Achieve File No.:2006/0007909W(File B/C 487/55)]; **《马来西亚华人聚落新村的想象与实践展》Pameran Nostalgia, Kampung Baruku.

¹ 资料整理自《马来西亚华人聚落新村的想象与实践展》，Pameran Nostalgia, Kampung Baruku，新村发展部（房屋与地方政府部），Viva home KL，2019年8月24日。

二、区域及概况

(一) 地理位置

史里肯邦安（Seri Kembangan），又称沙登（Serdang），是位于马来西亚雪兰莪梳邦再也东南边的一个华人新村。它是雪兰莪州42个华人新村中最大的新村，于全马来西亚华人新村位居第二，仅次于吉隆坡增江新村，村民多数为客家人，也是全马来西亚客家聚居人口最多的新村。地理位置处于联邦直辖区吉隆坡和中央政府行政中心布城之间，靠近南北大道南段路线的北端终点站，更是通往南面的交通要道，重要的地理位置，使沙登新村成为雪兰莪州迅速发展的重镇之一，总占地达834公顷，人口约20,000人，（郭秋香，2012a）拥有住户约2,000户，2011年《光明日报》报导99.9%为华人，（何欣瑜，2011）目前华人族群比例约为98%²。新村周边还与博特拉大学、国民大学、马来西亚油棕研究院和多媒体超级走廊为邻，东面有沙登商业区和绿野休闲城、曾经毗邻的一大片森林已经逐渐发展成新型花园住宅区。



图1：雪州华人新村图
资料来源：雷子健《爱新村——
雪州华人新村的美丽与哀愁》



图2：沙登新村位置图
资料来源：Google地图

沙登新村在传统华人新村分类中属A类市区边缘新村，建立时周边还是大片森林、胶园和锡矿场，村民传说当时森林中更有老虎出没。但如今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四周已被现代化城市所包围，和吉隆坡与布城的摩登繁华相比，沙登新村属于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地方，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从传统以农业、锡矿业为主的新村蜕变成今天繁华的城市，体现出马来西亚国家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地理优势是让史里肯邦安从新村蜕变成市区的主因，这里毗邻各个人口与基础设施发展完善的住宅区，包括斯里八

² 访问者：唐竟发（原沙登新村村长，2019年7月离职升任梳邦再也市议员），采访者：马瑛，地点：沙登新村，2019年1月5日。

打灵、武吉加里尔、蒲种、金銮镇、赛城以及布城³。但由于最初新村建立时统一的居住格局与客家人为主的聚居形式，使它与周边地区从房屋建筑或人文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二) 新村历史

沙登新村成立前，地名沙登已经存在。“沙登”之名音译自马来文“沙登树Pokok Serdang”，Serdang的中文名是蒲葵树，又称扇叶葵。华人喜欢用其叶子制作扇子，马来人则爱用来制作大鼓。中文沙登一名，明显是Serdang客家话的音译。早期，也有人译作沙戥、沙丁、最后才定名为沙登。马来文Serdang是指包含沙登新村在内的一大片区域，并不指沙登新村，沙登新村的马来文名为Seri Kembangan。

沙登区的开发与新街场息息相关。二战前后，新街场是举世闻名的锡产重镇，鸿发锡矿更是全球最大的露天采锡场。今天沙登区的绿野休闲城，便是鸿发废矿场的原址。1880年代，陈秀连在芎蕉园，又称十条半石，开设了隆兴锡矿公司。而后，陆佑创建鸿发锡矿场，胡子春创建新街场锡矿场。锡矿业的旺盛，催生了一个大聚落芎蕉园，可以说是沙登新村的前身。而当时的沙登埠（Pekan Serdang），即今天的旧沙登（Serdang Lama），盛况犹未及芎蕉园。（雷子健2012：19）

根据《马来半岛指南》（*Plus Guide to Peninsular Malaysia*），沙登埠是在1880年至1890年开发，而芎蕉园则早在1870年代已经存在。芎蕉园街上有近40间店铺，周围亦散居数以千计的华民，相比之下，沙登埠大街只有十多间店铺。共同点是，两地华民皆以客家人居多。到了20世纪初，锡矿和橡胶业并行发展，沿新街场路形成了众多聚落。老蒲种（Puchong Lama）就是其中一个，便是现在沙登新村所在地。聚落形成之初，只有几户人家，据称经常有老虎出没。直到英国人在此开垦了橡胶园，从此便有“新街场采锡，老蒲种种胶”之说。老蒲种周边的橡胶园，包括沙登园丘（Serdang Estate）、张九园丘（Choong Keow Estate）、巴朗勿刹园丘（Prang Besar Estate）、武吉加里尔园丘（Bukit Jalil Estate）、金銮园丘（Kinrara Estate）等。（雷子健2012：19）

1948年6月18日，英殖民政府正式宣布实施紧急法令，逮捕、扣留和驱逐涉及共产活动的人士。为了防止当地居民援助马来亚共产党，1949年，英军突然开入沙登区域，下达搬迁令，并强行拆屋，把散居在新街场、椰园、芎蕉园、沙登埠、古腰（Kuyoh）、横路、竹山拗和巴郎勿刹（Prang Besar，即布城）等地的约300户华人聚集在老蒲种古腰河边一片占地137公顷的胶园，辟出空地，将原居拆除的木板、白锌、亚答运来，让他们自己搭建房屋，沙登新村由此建立。

首批村民约300户，以中国惠州籍客家人居多，掺杂了部分广府人和高州人。日常生活水电均无，夜点大光灯、煤油灯或臭电灯，需挖井取水，保留到现在成了新村建筑的一大特点——天井。英殖民政府实施军事统治，全村围上铁刺网，实施戒严、宵禁，居民出入、一切物资，均严加管制，防止接济马共。新村建立后，村民们的谋生出路仍离不开“垦植、采矿、割胶”三部曲，采锡和割胶仍是主要经济活动，也有的村民靠种菜和养猪为生。此后，当局政府逐渐设立警亭、道路、学校、会堂、庙宇、

³ 整理自互联网资料Edgeprop，《重点报道：Seri Kembangan 琢磨蜕变中》，<https://www.edgeprop.my/content/1416415/重点报道：seri-kembangan-琢磨蜕变中>，2018年8月23日。

诊所、体育等基本设施。据何慧玲著《1948-1960紧急状态》，沙登直至1952年5月10日，方有红十字会进驻，提供医疗服务。1956年，沙登村民在雪州总警长卡德维尔（Caldwell）率领下，举行反共示威游行。动荡不安中，当局陆续迁入移民，沙登住户不断增长，至1960年，已是人口稠密的一个新村。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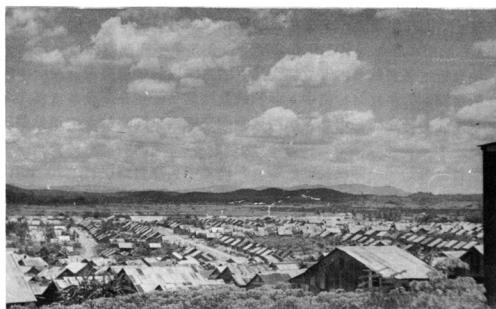


图3：1952年沙登新村



图4：沙登新村村民反共游行

资料来源：雷子健提供

1960年7月31日，东姑阿都拉曼宣布结束12年45天的紧急状态。新村的围篱被拆除，村民也不必再受严禁的管制。此时在人口不断的增长下，村民已有约15,000人，原来划分的12个区不敷居住，一部分村民把在古腰河旁及和平村一带的耕地改建成木屋，形成当时沙登新村最大的非法木屋区，大约有600余户。后来，木屋区地段被私营机构回收，居住在木屋的村民也被搬迁到组屋居住，该地一部分划为新村第13区，其余则成了和平天地商业中心。（雷子健201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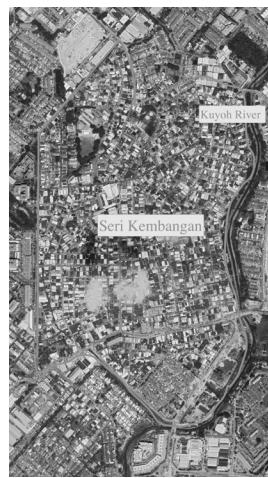


图5：沙登新村卫星图

资料来源：Google地图，2018年2月1日浏览，

<https://www.google.com.my/maps/place/Seri+Kembangan,+Selangor/@3.0089644,101.6506229,13839m/data=!3m1!1e3!4m5!3m4!1s0x31cdb55f1721e103:0x682c9d5e1c509291!8m2!3d3.021998!4d101.7055411?hl=en>, 2018年2月1日浏览

⁴ 整理自沙登新村文化工作者雷子健提供的未出版资料。

197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开始在大马计划拨款发展新村以提高村民的生活素质，并把新村纳入国家发展主流之内，沙登新村于1974年改名为史里肯邦安（Seri Kembangan），但村民还是习惯沿用沙登。政府当时推动及实行一系列发展计划如房屋发展计划，包括于1977年兴建史里沙登（Taman Seri Serdang）、沙登再也、沙登拉也、沙登岭、大学岭等，使村内及周边原有的2,500家住户增至15,000户。同时，沙登新村经济大转型，村民逐渐从农业与采矿业改行家具业、建筑业、种植杨桃和鞋业等。⁵

七、八十年代，农民响应“青皮书计划”⁶，新村村民在横港、古腰、和平村、双溪拉马一带开始栽种杨桃，并由于土质好杨桃鲜甜出口至欧洲、中东、日本等国，使沙登成了名噪一时的杨桃村。（郭秋香2012b）直至1990年代，政府收回土地，杨桃才逐渐式微。《爱沙登》社区报中村民张先良提及：“我在横港种了将近20年杨桃，1989年被夷为平地，政府甚至出动军警，封锁了所有杨桃园。”（曾秉钧2013：11）

同一时期，沙登区制鞋业兴起，主要分为制鞋工厂和家庭手工作坊两类，沙登新村大部分都属家庭手工作坊，全盛时期达到二百余户，近乎90%的村民从事与鞋业相关的行业，（邓伟秀，2008a）发展成为当时马来西亚鞋业制造中心。目前还在开鞋包厂的村民李育明提到：“当时的鞋业主做品牌代工，以男鞋为主，45%出口东南亚。随着中国制鞋业兴起，由于马来西亚制鞋原料95%依赖进口，价格没有优势，鞋业市场逐渐被中国取代，新村制鞋业迅速衰落，现在已很少见。”⁷随后的经济大萧条，村民有一些出去“跳飞机”，指出国去台湾、日本等地打工，在当时影响很大。也正是八、九十年代，新村周围接连出现了博特拉大学、马来西亚国立大学、马来西亚油棕研究院和多媒体超级走廊等发展计划。新村经济获得极大改善，拥有车辆的人数增加，开始形成目前仍是新村最大问题的交通拥堵。

2000年后，沙登逐渐从一个简陋的新村发展为现代化城镇，经济活动已逐渐由农业转为城市化行业，例如饮食业、服务业、汽车业、印刷业、电子科技业、旅游业等。这些经济发展同时制造了就业机会，使年轻一代没有向外流失，新村周边人口反而逐年增加，学校教育水平也相应得到提升。

2010年，时任雪州行政议员、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促成沙登区与中国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结为友好城市，签署谅解备忘录，达成1. 加强贸易、社区能源、科技合作；2. 鼓励民间交流；3. 促进文化教育友好往来三方面协议。（赖征涛 2010：4-5）

2010年至今，沙登新村在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也不断面临很多问题，如新村的交通拥堵严重、公共基础设施老旧、排水系统不畅、环境卫生不佳等，为村委会及雪州政府的治理带来挑战。很多年轻村民选择搬去新村周边如花园区居住，并不属于新村

⁵ 整理自互联网资料The star online, *Seri Kembangan - from village of 50 houses in 1952 to 2,500 now*. <http://thestar.com.my/metro/story.asp?file=%2F2008%2F4%2F18%2Fcentral%2F20986159&sec=central>, 18-4-2008.

⁶ “青皮书计划”（马来文 Rancangan Revolusi Hijau），7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并鼓励人民栽种蔬菜以便缓和粮荒的压力，而且为发展国民农业生产，推行了“青皮书计划”。当年首相敦拉萨的政府大力推展并鼓励人民参与这项增加粮产的计划，鼓励老百姓将荒芜的土地开发栽种蔬菜水果，以期自供自足，普遍上获得民众，尤其乡区居民的热烈响应。

⁷ 受访者：李育明（沙登村民，鞋包厂老板，以前做鞋包代工，现做工业用鞋），采访者：马瑛，地点：沙登新村，2018年12月17日。

范围，但日常生活仍在新村。因此，新村中常以老人和未成年人居多。新村常住人口约20,000人，加上周边新村外流人口共约30,000人。城市化发展也带来廉价劳动力需求，新村市场、店屋、餐厅等营业场所经常雇佣外劳，有些选择住在新村，也为新村安全问题带来一定的隐患。从2016年开始，雪州政府豁免廉价屋、村屋的门牌税及小贩执照费。陆续实施一系列雪州人民福利计划，沙登村民均可受惠，包括1.免费供水（Air Percuma）、2.雪州乐龄亲善基金（SMUE）、3.雪州新生儿基金（TAWAS）、4.雪州子女大学深造奖励金（HPIPT）、5.园丘工人子女基金（Tabung Anak Pekerja Ladang）、6.妇女健康计划（Skim Kesihatan Wanita）、7.雪州政府微型贷款计划（Skim Hijrah Selangor）、8.人民补习计划（PTRS）、9.幼儿援助计划（SiKEMBAR）、10.雪州幼儿园学生津贴（TUNAS）、11.青年结婚奖励（Insentif Perkahwinan Belia）、12.食粮补贴计划（Food Stamp）、13.免费巴士（Bas Smart Selangor）、14.免费上网（WIFI Smart Selangor）、15.雪州房屋计划（Skim Rumah Selangorku）、16.关怀健康医药卡（Peduli Sihat）、17.雪州政府大学贷学金（TKWBNS）。（黄宏英2017: 7）欧阳捍华在与笔者访谈中提及，对于沙登新村未来的发展规划，州政府也会主要集中在提升基础设施、加强新村治安、推动文化艺术活动等方面，同时鼓励乡团开设客家学习班，鼓励保持客家文化。⁸

（三）族群构成与职业

1、族群构成

调查问卷是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依据Robert V. Krejcie和Daryle W. Morgan1970年发表论文*Determining Sample Size for Research Activities*中的固定人口取样量表，预估沙登新村人口30,000人（N=30,000），取样应为379（S=379），本次共回收有效问卷380份，其中男性受访者186名，女性受访者194名。问卷分四个年龄段，其中15-20岁102人，21-40岁109人，41-60岁93人，60岁以上76人，受访者新村平均居住时间为30.68年。调查问卷结果采用SPSS软件分析，在t检验中以性别为自变量，单因素方差分析中以年龄为自变量，事后检验结果用来分析不同年龄组有无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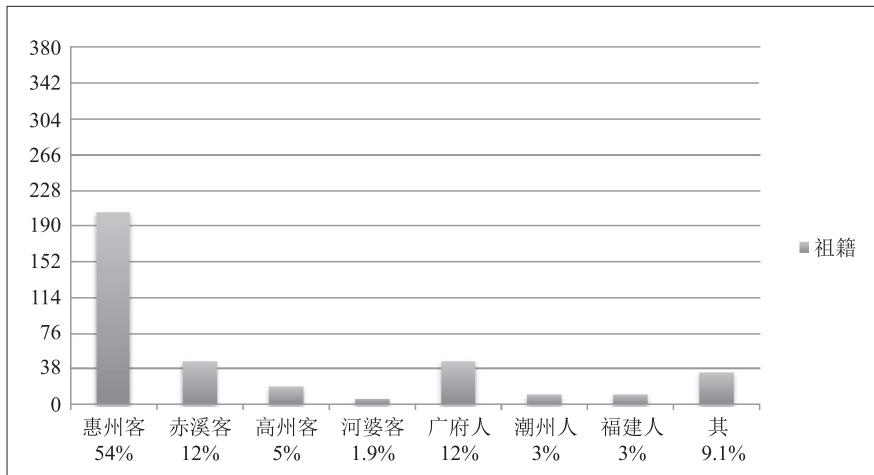
原沙登新村村长唐竟发在访谈中提到：“沙登新村华人比例约占98%，马来人除警察外基本没有，警察都住在警察宿舍，印度人很少，大概二十多家，也有少量外劳租住在新村。”⁹

在如下华人村民祖籍及方言群统计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客家人占新村华人比例的72.9%，分别来自中国惠州、赤溪、高州、河婆四地，其中以惠州客家人最多，占比54%，超过新村华人半数。其次为广府人占比12%，潮州人、福建人不多，占比3%，其他占9%。

⁸ 受访者：欧阳捍华（雪兰莪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曾长期负责管理雪州新村事务），采访者：马瑛，地点：沙登新村，2019年1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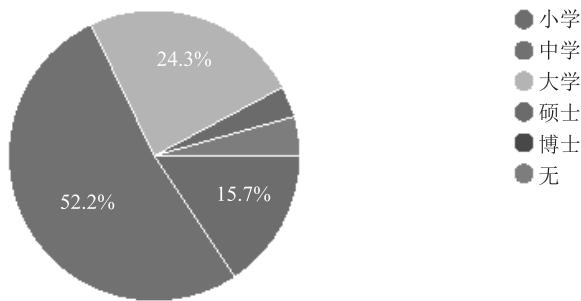
⁹ 受访者：唐竟发（原沙登新村村长，2019年7月离职升任梳邦再也市议员），采访者：马瑛，地点：沙登新村，2019年1月5日。

表2：村民祖籍（方言群）统计表



2、村民受教育水平

表3：沙登村民受教育水平



上表显示，村民接受过中学教育的占比为52.2%，超过半数；大学学历占比24.3%，小学学历占比15.7%，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村民占比4.9%，硕士学历占比2.9%。因此，村民的平均教育水平为中学，小学及未接受过教育占到20.6%，教育水平中学及以下占总数的72.8%，相比周边区域，普遍受教育水平不高。

表4：受教育水平性别差异表

		教育					总计
		无	小学	中学	大学	硕士	
性别	男性	9	35	95	47	0	186
	女性	8	26	98	51	11	194
总计		17	61	193	98	11	380

上表4从性别上来讲，男女数量在大学及以下的学历中差异不大，除了在仅获得小学学历的人群中，男性数量略多于女性。但是在本样本中受过硕士教育的只有女性。没有人接受过博士教育。

表5：受教育水平年龄差异表

	年龄	教育					总计
		无	小学	中学	大学	硕士	
年龄	15-20	0	0	70	32	0	102
	21-40	5	0	51	44	9	109
	41-60	4	27	41	19	2	93
	>60	8	34	31	3	0	76
总计		17	61	193	98	11	380

由表5可见，15至20岁中全部人群都至少接受过中学教育，并且约三分之一接受过大学教育。同时15-20岁人群仍为学生群体，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会进入更高的学府接受教育。21-40岁的人群中只有5名未接受过教育，其余均为中学或者大学学历，同时有9名具有硕士学历的人，拥有中学学历的人最多。41-60岁的人群中，具有大学学历的人数明显减少，多数人为中学和小学学历，小部分人未接受任何教育，仅有两名具有硕士学历的人，仍是拥有中学学历的人最多。年龄大于60岁的人群中，仅有三位接受过大学教育，其余均只接受过小学或初中教育，其中小学学历的人最多，同时在四个组别中未接受教育人数也是最多的，共有8名未接受任何教育。综合来看，年轻一代相较于上一代接受教育的水平显著提高。

3、村民职业

根据调查问卷结果，将沙登新村村民职业分类汇总如下：

表6：沙登新村村民职业分类

职业	分类
专业技术人员	审计师
教师、医护人员	教师、中医师、药剂师
行政人员、管理人员	人力资源、行政经理、沙登新村村长
办事人员	打工、文职、客服、杂工、书记
商业人员	五金店老板、小贩、销售人员、公司董事长、卖鱼小贩、卖烧肉小贩、卖衣服、饮料生意、杂货小贩、水果小贩、卖鸡小贩、卖糕（住家式）
服务业人员	餐厅老板、咖啡店老板、咖啡店助手、饭店老板、餐厅收银导游、发型师、殡葬业者、司机、厨师
农业劳动者	割胶
生产工人	建筑工、装修工、烧焊工

由表6可见，村民职业最多集中在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两大类，商业中以市场小贩及小型零售业者为主，服务业中从事餐饮业者居多。行政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很少，农业劳动者也不多见。与下面2000年马来西亚华人就业人员职业结构表来做对比（Pang Hooi Eng 2000: 109），我们发现：2000年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职业结构比例最高的是行政人员、管理人员占47.8%，商业人员次之占45%，之后排序为生产工人占35.8%、办事人员占30%、专业技术人员占24%、服务业人员占20.2%、教师医护人员占17.3%、农业劳动者占11.6%。以此对比沙登新村村民职业，再结合上文村民整体受教育水平来看，沙登新村村民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分层中所处位置不高，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或社会精英阶层人员并不多见。

表7：马来西亚各族群就业人员职业结构（1957-2000）

职业	华人				
	1957	1970	1980	1990	2000
专业技术人员	38.1	39.0	33.6	29.1	24.0
教师、医护人员	36.0	23.5	31.2	24.6	17.3
行政人员、管理人员	62.3	65.0	64.2	62.2	47.8
办事人员	46.2	48.1	38.8	38.6	30.0
商业人员	66.1	66.4	62.5	58.4	45.0
服务业人员	33.3	39.1	29.0	26.8	20.2
农业劳动者	24.3	21.0	18.3	13.8	11.6
生产工人	55.7	54.9	46.1	39.6	35.8

新村中，目前还能见到为数不多的几家传统行业凸显客家特色，都是住家式手工作坊，如纸扎店、棺材铺、藤条家具店和客家糕饼店，店主均是祖辈从事该传统行业，除客家糕饼店生意不错之外，其余几家均表示在勉强维持，更有些传统行业已于前些年消失，如吹风箱铸造铁器、锌铁匠（俗称白铁匠）、打金匠、磨剪刀、梅花棺制作、制香等。（邓伟秀，2008b）

三、居住形式与房屋

（一）居住形式

沙登新村目前共划分13个区，前12个区为新村建立之初划分，1960年代后人口增加原来划分的12个区不敷居住，一部分村民把在古腰河旁及和平村一带的耕地改建成木屋，形成当时沙登新村最大的非法木屋区，大约有600余户。后来，木屋区地段被私营机构回收，居住在木屋的村民也被搬迁到组屋居住，该地一部分划为新村第13区，新村每户占地面积均为80×50尺，共4,000平方尺。1949年最早迁入的村民住在第10、11区，当时封闭管理的大闸门就设在第11区，有警察站岗，因此警察局、警察宿舍都在

附近直至现在，共有十多家马来人住户，讲马来语但懂一些客家话¹⁰。1950年村民陆续迁入沿着古腰河居住形成第12区，同时第8区开始建立，为当时的商业区，建筑有店屋形式。第3区建立时就是20间店屋，因此路名就叫20间店路。1960年代，村民自己筹钱新建民众会堂，成为此后的村民活动中心，70年代划分出第13区。当时按照英殖民政府的规划，每区都至少有一个村民活动区域，所以现在新村中有十个以上的休闲区，目前有的建成球场，有的供村民活动、散步。¹¹

2017年，雪州政府在州内77个新村、渔村及重组村设置双语路牌，即路牌上同时有马来文和中文。沙登新村是雪州最大的新村，道路也最多，约200个路牌。因此沙登的中文路牌也是州内最多的，共83个并多以客家方言命名。根据规定，路牌中的马来文字，必须比中文字大30%。如女皇街（Queen's Road, Jalan Aman上半段），皇帝街（King's Road, Jalan SK1/2），占士路（James Road, Jalan 7/12）等。（雷子健2017a: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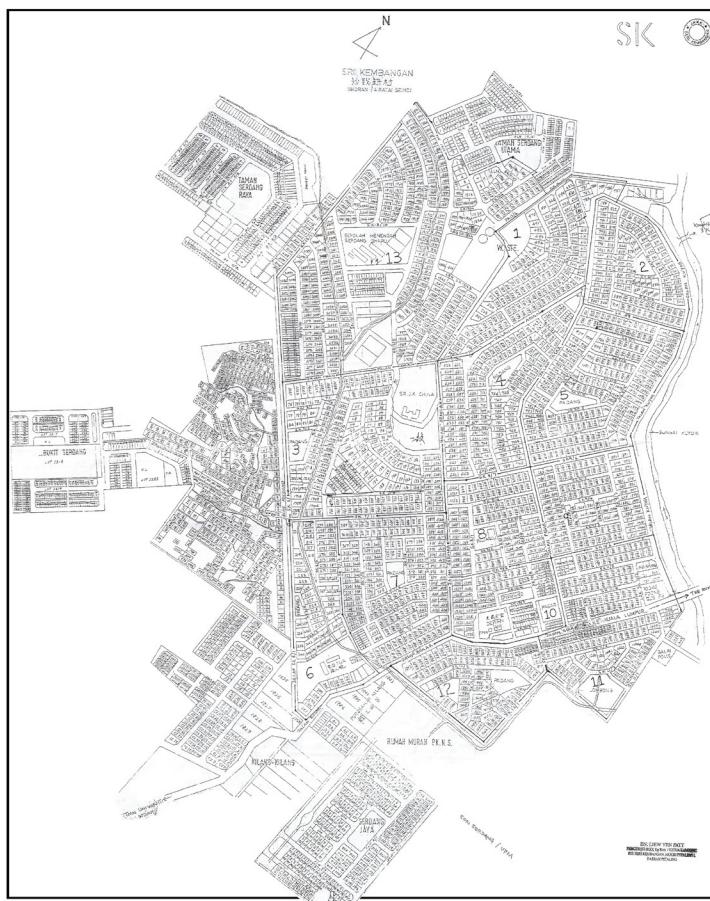


图6：沙登新村分区图

资料来源：雷子健提供

¹⁰ 受访者：林镇廉（沙登新村巴刹店铺老板），采访者：马瑛，地点：沙登新村，2018年12月4日。

¹¹ 受访者：雷子健（沙登新村文化工作者），采访者：马瑛，地点：沙登新村，2018年11月26日。

(二) 房屋类型

新村最早的第一代房屋是纯木板屋，由木板、亚答叶等材料搭成，目前维持原样、保留完好的大概占5%；第二代房屋下面是三尺砖，上半部是木屋结构，也叫半砖半板结构；第三代是70%砖造屋，外形砖，里面木板，屋顶锌片；第四代80年代的房屋已是全砖、瓦片屋顶，出现两层结构；第五代房屋2000年左右出现，随着新村城市化发展，富裕家庭开始兴建独立式别墅，有些高达三、四层楼。



图7：第1代村屋



图8：第2代村屋



图9：第3代村屋



图10：第4代村屋



图11：第5代村屋



图12：中文路牌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2018年4月，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社会参与活动“沙登新村文化绘图”，对新村13个区的房屋数量、类型及堂号展开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600份。调查结果如下表：

表8：沙登新村房屋调查表

区域: 1-13		问卷数量: 1600份			
村屋类型	数量	村屋居住情况			郡望/堂号 数量
		村民自住	出租	空置/无人居住	
纯木板屋	183	62	7	29	21
半砖屋/半砖半板(单层)	373	104	19	34	46
全砖屋/70%以上砖造(单层)	836	222	22	34	30
两层式房子(双层砖屋)	196	53	6	9	9
三层式或以上(砖屋)	64	21		4	
其他类型	27	2	2	3	
有地无屋	73				
总数	1752				106

资料来源：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社会参与活动“沙登新村文化绘图”成果。

调查结果显示，沙登新村第1至第13区五类村屋的数量共1,752间，与所见报章等文字资料的2,600间有所差异。（郭秋香，2012a）估计随有些村民搬出，村屋变化，再结合调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差，确定村屋数量约为2,000间。建筑类型还是以第三代全砖单层房屋为主，第二代半砖半木结构次之，后为第四代双层砖屋与第一代木板屋，第五代独立别墅三层以上并不多见。另外，有地无屋的情况也有存在。

堂号指家族门户的代称，是家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同姓氏有不同的堂号、郡望与堂联，是华人文化中重要的一环，尤其对海外华人而言。客家人由于注重崇先报恩，尊祖敬宗，所以特别重视修谱牒、建祠堂、祭祖先，而祠堂的堂号、堂联最好地表达了客家人思念祖先，弘扬祖德的情感。堂号作为祠堂的名号，是某姓的标志，代表着族源和血统、历史和荣誉。据沙登新村文化工作者雷子健说：“堂号以前家家有，现在只有一百间左右，全村两千多间房屋，只占5%，以江夏为主。”由上表见，新村堂号调查结果总数106个，主要出现于第1、2、3代房屋。

表9：沙登新村堂号与姓氏表

新村郡望/堂号									
江夏	渤海	安居	新潭记	武溪	彭城	颍川	河南	南阳	安定
忠恕	宝树	敦煌	谯国	高平	东海	兰陵	四知	太原	陇西
京兆	河西	钜鹿	沛国	平始	至德	西龙	天水	豫章	岐山
莱阳	河间	汝南	清河	乐安	武陵	冯翊	黄内	荣阳	高阳
杨济	吴兴	永祥	刘桂堂	仙娘					

村民主要姓氏									
余	骆	郑	黄	邱	陈	张	曾	魏	苏
叶	萧	刘	李	温	吴	练	周	罗	梁
胡	朱	杨	唐	卢	王	谢	杜	林	锺
施	雷	董	蔡	高	古	钟	田	戴	赖
徐	江	康	许	冯	何	钱			

资料来源：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社会参与活动“沙登新村文化绘图”成果。

依表9，106个郡望/堂号中去除重复共45个，以江夏较常见、颍川、渤海次之，有间村屋以前是神坛，现在改成民居，堂号“仙娘”，应已不是最初堂号的意义。姓氏共记录47个，其中以黄、吴、陈居多。

四、社会组织与教育

(一) 社会组织

1、政府管理

沙登新村一直隶属于雪兰莪州政府管辖，村中设立“发展暨治安委员会”（Jawatankuasa Kemajuan dan Keselamatan Kampung, JKKK），由政党推荐人选出任委员会主席（即村长），负责替村民解决民生问题，并充当政府及村民的中间人。2018年希望中央政府执政前，槟城、雪兰莪、吉兰丹三州由当时的反对党掌管，与中央政府并不一致，因此这三个州的新村长期出现两个村委会及村长的局面，分别是州政府下辖的村委会JKKK以及由马华公会设立的当地支会，后者直接归当时的中央政府管理，沙登新村也不例外。在有雪州政府设立的村委会及村长之外，马华公会也于沙登新村设立联邦村长，参与新村建设及发展事务。该现象随着2018年希望中央政府执政，马华公会在野后发生变化。

2、民间组织

据村民古天福访谈中说：“1949年沙登新村开始建立后，政府派警察监视管理，同时让马华成立公会代表华人参政，新村自己并没有管理者，全靠帮会管理。在成立地方议会之前，也没有村委会和村长。帮会或者私会党，是新村里最大的民间组织，基本每个村民想出去做工，都得投靠帮会，主要是洪门，后来慢慢分成几个社团。”目前沙登新村的民间组织主要有民汉俱乐部、庆余俱乐部、侨民体育会、新街场体育会四个，很多村民提及均是由帮会或会党组织发展而来。据村民张彝回忆，当时的地下帮派还有三百六、零八、华记、二合四、龙虎堂等。¹²

村民古天福还提到：“沙登新村当时也有共产党，全马来西亚新村最高峰有2,000多共产党，沙登有七、八家组织，宣传争取马来亚独立，平时派发传单和书，并成立

¹² 受访者：张彝（沙登华小一小前董事长、新街场路发展华小工委会前主席（七间华小）、吉隆坡循人独中董事），采访者：马瑛，地点：沙登新村，2018年12月4日。

文化班组织参与者一起学习。一般都不是公开活动，读中学时看别人宣传，平时组织活动就是看书、跳舞等，办年轻人喜欢的活动。”¹³1959年沙登人民党成立，强势主导了沙登的地方政治，并带头开创了沙登的文艺活动。将左翼政党活动推向高潮。

(曾秉钧2010: 11)村民李育明提及：“马共第二波活动在七十年代，纷纷上山打游击战，沙登新村大概有300多的年轻人参加。”¹⁴



图13：沙登新村早期左翼政党活动

资料来源：雷子健提供



图14：沙登人民党文艺活动

资料来源：《爱沙登》社区报

目前，沙登新村还活跃的民间组织主要有民汉俱乐部、庆余俱乐部、侨民体育会、新街场体育会四个，日常主要以举办文娱活动、提供村民休闲与各类慈善捐助活动为主。

(1) 民汉俱乐部

民汉俱乐部的创立，受革命党人孙中山与尤烈影响很大。孙中山是中国“革命之父”，1900年代曾屡次到南洋宣传革命，尤烈则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是中国中和党、香港中和堂两大洪门组织的创办人。1900年惠州战役失败，尤烈逃到南洋，在各地遍设中和堂。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中和堂在南洋大张旗鼓，建立许多分堂与组织，民汉俱乐部正在其中。¹⁵马来西亚学者徐威雄对南洋中和堂的特点总结有三：“一为其组织不大，类如一般职工会所，故冯氏称之为‘小俱乐部’；（冯自由1946: 56）二是其成员多来自农工界，以膜拜关公为号召，甚有会党的色彩；三是其堂内备有各类书报，以开民智和宣传革命，这点像书报社的教育目的，而又具有革命性质。就是这几个特点，构成了当时所谓的俱乐部。”（徐威雄，2013）

1937年，沙登民汉俱乐部由黄日、钟月、郑富、宋甫等人在沙登芭蕉园创办，租用一间店铺为会所，主张“以和为贵，以礼待人”，悬挂孙中山与尤烈肖像，会徽为蓝色八角星，与中国国民党党徽相似。主席是黄日，会员不到30名，多为矿工、胶工和杂工，又以客家人、广东人居多。创会主席黄日，本身便是鸿发锡矿的管工。最初

¹³ 受访者：古天福（沙登人民巴刹小贩公会前主席），采访者：马瑛，地点：沙登新村，2019年1月5日。

¹⁴ 受访者：李育明（沙登村民，鞋包厂老板，以前做鞋包代工，现做工业用鞋），采访者：马瑛，地点：沙登新村，2018年12月17日。

¹⁵ 整理自沙登新村文化工作者雷子健提供的未出版资料。

作为联络站时，会员主要喝茶聊天，偶尔有人玩推牌九，也有人帮会员写家书，同时作为会员固定联络地址，成立至今已82年。（民汉俱乐部2009：10）

1941年，日本打入马来亚，民汉俱乐部和其他华团一样停止了活动。1945年战争结束，民汉才重新开始活动。1949年，民汉俱乐部正式注册、挂牌“芎蕉园民汉俱乐部”。

1955年，民汉新会所开幕，创立沙登首个醒狮团。1957年独立以后，转型本土化。1960年迁往戏院街新会所，地段由当时主席宋甫捐出。2003年4月23日，遭遇火灾，所有文物全部焚毁。同年10月，新会所原址重建。2007年8月，成立妇女组，主办了不少社团活动。2008年6月，成立青年团。2009年会员已达五百多人，2010年后，帮派色彩、封建思想淡化，重心逐步放在社会公益活动方面。（民汉俱乐部2009：10）

另外，民汉俱乐部与马来西亚加影民生体育会、淡江侨安俱乐部、彭亨双溪兰民安俱乐部找到同属中和组织的联系，与香港八和堂、新加坡中和互助会也曾有交流和往来。（民汉俱乐部2009：10）

（2）庆余俱乐部

1947年，为救助贫病和危难华工，庆余俱乐部于沙登芎蕉园（今绿野休闲城）创立，取名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1940年代，下南洋的华工大都孤苦无依、人地生疏，遇上问题后无法处理。很多人感染伤病，无钱就医，更无人照顾，甚至病死后也无人料理。1948年紧急状态，英殖民政府全力打击马来亚共产党，断绝他们与华工的联系，另一面马来亚共产党也开展锄奸活动，许多华工成为“夹心人”，受到不人道的对待甚至惨遭杀害。在此情势下，由黄大牛带领，罗柱、古胜、赵全、梁雅，余福坚、梁福记、罗盘、周牛、黄毛仁等人联合发起创立了庆余俱乐部，以维护华工命运。

庆余俱乐部的首要任务就是济助贫病无依的华工，包括帮他们请大夫、照顾起居、筹措医药费、料理后事等。除了病逝者，庆余也为意外丧生或被英军与马共枪杀者料理后事。紧急状态时期，遭英殖民政府驱逐出境者，庆余也帮他们筹措路费。

1949年，庆余俱乐部随芎蕉园乡民一起迁入沙登新村，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转向社团方向发展，主要有醒狮团、体育和康乐三组。1969年，政府在沙登建立医疗所，副首相敦拉萨亲临开幕，由庆余狮队担任迎宾狮队。1970年，庆余单层砖墙新会所建成，时任财政部部长敦陈修信主持开幕。1983年，庆余醒狮团正式成立。1999年云顶全马来西亚狮艺观摩赛，庆余获得亚军。1989年，沙登华小二校筹建大礼堂，庆余狮团连续两年贺岁义舞，为二校筹款40,000多令吉。1998年吉隆坡奥运会，庆余狮团再获殊荣，成为迎宾狮队，迎接各国领导、嘉宾和选手。1999年，庆余俱乐部重建一栋三层楼新会所，目前约有会员六百余名。¹⁶

（3）侨民体育会

1912年，侨民体育会于沙登埠（Pekan Serdang）创立，旨在发扬中华武术，兼为当时侨民提供联络站。1920年，公民华小建校之初，教室不足。侨民体育会借出会所供

¹⁶ 整理自沙登新村文化工作者雷子健提供的未出版资料。

学生上课，公民华小则借出场地，供侨民体育会会员习武。

1941年，侨民体育会以曾金为首的华工，向当时政府申请注册，1942年注册成功。曾金出任总理，徐谭、黄石松、文亮、黄莲、钟长、黄锦光、骆恩、练月、文谭、卢德、许英、陈森忠、杜发、赖珊、何玉光、叶运、赖木、温养、黄娇、黄纪麻、黄幸、陈添、赖安、文木、黄佛和等人成为首批会员。侨民体育会以“忠孝廉耻是为人之本，仁义礼智信是处世之道”为会训，以“联络各侨胞感情、提倡正当体育活动、致力公益慈善教育”为会旨。自成立后，短短三个月，招募百余会员。1948年紧急状态，仍四处奔走，招侨入会。1950年代初会员激增至四百多名。1957年马来亚独立，移民政策改变，会员剧降。

1960年代，侨民体育会增设舞狮团、麒麟团、舞猢狲等武术与文化活动。1967年，国家独立十周年，因参与筹办社区庆典获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颁发荣誉奖状。1970年代，组织篮球队，参加苏丹杯、独立杯等大型篮球比赛。1980年，麒麟团和猢狲团因青黄不接暂停活动，直到2006年复团。1980年代顶峰时期，会员达到2,500人，1981年迁往沙登再也花园新会所，目前会员1,300人左右。

侨民体育会设有伤残福利金、子女奖励金、大学奖学金等会员福利，历任总理主要有曾金、许英、张宝森、梁文洪、叶国强局绅。¹⁷

(4) 新街场华人体育会

新街场华人体育会的创立，离不开新街场盛极一时的锡矿业。作为矿产重镇，新街场矿工云集，只是常无落脚之地，也无联系更没有照应。1948年，黎德禄锡矿场的杨庚胜、汪统、骆贤送等十余矿工，率先发起成立，以照顾矿工福利。

成立之初，并无定名，只以新街场一间茶室为联络中心，杨庚胜为领导。1952年申请注册，正式定名“新街场华侨体育会”，林庆祺医生成为第一任主席，在新街场大街租用一间店铺为会所。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开始转型为名副其实的体育会。首先，提倡篮球运动，组织篮球队。1960年，成为雪兰莪州第一个自置篮球场的体育会。1960至70年代，篮球队于州、区赛多次获奖，多位篮球手脱颖而出。1970年代初，更名“新街场华人体育会”。1976年成立的醒狮团，在2008年第一届“雪州狮王争霸赛”中夺得冠、季军。

1990年代，由于矿业没落和地方发展问题，以及会所自身问题决定迁址。1996年，耗资四十余万令吉，在沙登新村学校路购地新建三层楼会所。1997年，正式迁入沙登新村。目前，新街场华人体育会除推进体育活动外，也转向社团活动，对华小和地方建设给予不少帮助，会员约1,300名。至今历任会长为林庆祺、杨国富、陈潭元、萧子云、黄氯华、朱木生。¹⁸

另外，1969年11月18日成立的沙登新村学校校友会，长期致力于推动沙登新村的文化、教育事业，组织热心人士捐资助学、修建校舍，为沙登新村引进了不少文化、艺术演出活动，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也是新村民间组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¹⁷ 整理自沙登新村文化工作者雷子健提供的未出版资料。

¹⁸ 同上注。

(二) 学校教育

沙登新村目前有国民型华文小学一校 (SJK(C) SERDANG BARU 1)、国民型华文小学二校 (S.J.K(C) SERDANG BARU 2)、史里肯邦安国民中学 (S.M.K SERI KEMBANGAN) 三所学校，国民型华文小学二校由一校分出，校址位于新村周边的沙登再也 (Serdang Jaya)。国民型华文小学是马来西亚国家教育体系下以华文作为主要媒介语教学的六年制公立小学，除马来文、英文科外，其它各科目均采用华文授课及考试。国民中学是隶属于马来西亚教育部以马来语和英语作为主要媒介语的五年制公立中学。

1、沙登新村国民型华文小学一校 (SJK(C) SERDANG BARU 1)

新村华小一校前身为沙登新村学校，建于1951年，前称培英学校。

1949年沙登新村始建时，英殖民政府利用拆除自新民、育民、培正、古腰学校的旧建材，建立了培英学校。1951年，培英学校开幕，由钦差大臣葛尼主持，当时学生300余人，曾进任董事长、李国荣任校长。1952年，政府把培英改名为沙登新村学校。短短一年，学生倍增至650人，1958年突破千人。1966年，再剧增至1,900余人，教师五十余位，教室三十间，规模成为全马来西亚新村华小之首，教育部批准设立分校分校。1967年，沙登新村华小二校正式创立，卢振明任校长。沙登新村学校则改称一校，由于未有校地，二校与一校共校，上、下午轮流上课。1969年，一校开始新建校舍，分三期进行，每期建三层楼12间教室，分别于1975、1980和1987年竣工。

1974年，家教协会成立，首任主席郑谭发先生。1975年，第一期三层新校舍落成，共有12间教室。董事会开始筹建礼堂计划及第二期校舍计划。1976年，谭国良出任第七任董事长，兼任礼堂建委会主席，一校与二校联合举行恳亲游艺会筹募校舍基金。1978年，两校再度筹款，以增建五间教室。1980年，第二期三层新校舍，共有12间教室落成启用。1981年，张彝出任第八任董事长。1982年大礼堂落成启用，并于11月6日开幕。1985年，多用途馆落成启用，底层为乒乓室、牙医室，二层为图书馆、电脑室，三层为教师宿舍。1987年，董事部增建一座三层校舍，共耗资62,000元。1997年，行政楼落成启用。2008年行政楼顶层舞蹈室落成。2011年，政府兴建的教学楼完工，并正式移交给校方使用。2012年，成立沙登民间故事馆并对社会开放参观，馆内收藏由新村老居民捐献的日常生活器皿、老照片、琉璃盆、锡米、黑胶唱机、割胶工具、黑胶唱片等文物，复原最早村屋及当时客家村民的生活、工作场景，为参观者讲述沙登新村的历史，介绍客家文化、表演客家山歌，是外界了解沙登新村的窗口。2016年六十五周年校庆，在校园各角落增添多个书架，让学生随时能进行阅读以营造书香校园。¹⁹

目前该校共有学生1,944人，教职员87人²⁰，一校1981年董事长张彝提及，当时一校学生约1,000人，90%以上都是客家人，开始有马来学生报名，马来人也收，学校没有印度人。

¹⁹ 整理自沙登新村国民型华文小学一校官方网站，沙一简史，
http://www.serdangbaru1.edu.my/2010/05/blog-post_21.html，2019年1月2日。

²⁰ 整理自笔者沙登新村国民型华文小学一校田野调查资料。

2、沙登新村国民型华文小学二校 (S.J.K(C) SERDANG BARU 2)

1967年1月1日沙登新村国民型华文小学二校正式创立，卢振明任第一任校长。她的前身为沙登新村学校（创立于1951年）。沙登新村学校改称一校，由于未有校地，二校与一校共校，上、下午轮流上课。

七十年代末期，学生人数逐年剧增，两校已近4,000人。校方向教育部申请拨地另建校舍，由当年二校家协主席林辉煌县议员为首成立沙二建校工委会，1983年向教育部提呈有关的备忘录，雪州行政议员兼本区州议员拿督叶炳汉则向州政府申请新校地。1985年5月7日获雪兰莪州政府批准拨出位于沙登再也 (Serdang Jaya) 约六英亩地段作沙二新校地。1986年4月10日，新校舍破土动工。

1987年4月20日，全体师生1,600余人正式从沙登新村国民型华文小学一校校址迁至新校舍上课。1989年筹建大礼堂暨行政楼，1992年大礼堂、行政楼落成，耗资一百万令吉。1995年C座新校舍启用，2000年资讯楼落成启用。2002年提升礼堂及行政楼办公室设备、修建礼堂厕所、建有盖走廊、添购乐器等。2005年兴建D座三层楼新校舍与保安亭，2006年D座三层楼新校舍启用并筹建活动中心，2008年活动中心竣工。

2009年推行精明课室计划，为学校50间课室装置通讯科技器材，耗资50万令吉。2013年E座校舍及教师办公室落成，2014年安装电子白板及数码电脑器材，2017年设立历史隧道、美化校园、阅读角落等。²¹目前在校学生3,000多人，教职工135人。²²

3、史里肯邦安国民中学 (S.M.K SERI KEMBANGAN)

1965年史里肯邦安国民中学 (SMKSK) 正式建校，当时名称为沙登新村国民型（英文）中学。1965年，由时任副首相的已故敦阿都拉萨主持史里肯邦安国民中学的校园开幕仪式。

1969年史里肯邦安国民中学的学生首次参加初中教育证书考试 (LCE)，通过率达到78%，但中学4年级的学生被迫前往其他学校就读。1975年建立了科学实验室及资源教室等两间教室及四间普通课室。1977年首次举办年度运动会。1980年理科班正式开课，专门为中学三年级那些达到一定成绩的学生辟出一间课室以供学习。1988年SMKSK草场开始动工，2003年1月5日露天礼堂竣工，2004年学校增建H栋校舍以容纳逐渐增长的学生人数。2007年在拿督廖润强的资助下，建造从学校大门通往家长及教师协会 (PIBG) 礼堂的格嘉走廊以及C栋放映室前面的知识走廊。2010年学校合作社出资在C栋合作社前建立知识学习区。2015年沙登狮子会出资建造多媒体教室。2016年Feruni Ceramiche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拿督魏志超赞助家长及教师协会礼堂及放映室的走廊铺设地砖升级工程。²³

据前史里肯邦安国民中学校长戴庆义（2019年退休）提及，该校是全马来西亚唯一将华文课放入正课的国民中学，课时依据马来西亚课程大纲，每周2课时，旨在大力推

²¹ 整理自沙登新村国民型华文小学二校官方网站，学校简史，http://www.serdangbaru2.edu.my/hom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layout=blog&id=43&Itemid=39，2019年1月4日。

²² 整理自笔者沙登新村国民型华文小学二校田野调查资料。

²³ 整理自笔者史里肯邦安国民中学田野调查资料。

动且公平对待三大种族的文化教育、节庆活动等，并开设书法选修课。²⁴目前该校共有学生3513人，教职员183人。²⁵

五、信仰、风俗与饮食

(一) 信仰崇拜

马来西亚客家民间崇拜习俗，主要是祖先崇拜和一般地方神明崇拜。祖先崇拜和一般地方神明崇拜，历来具有血缘性与地缘性特征。大马客家的崇拜习俗，既存在以保持宗亲、方言集团为核心的传统崇拜方式，又出现了以开放心态接纳其他方言集团进入自身祭祀圈的情况，或自身被他方言集团接纳从而进入他方言集团崇拜习俗的“变异”形式。（刘丽川2013：1）沙登新村的信仰崇拜，也大致符合这种情况。

问题1：您经常崇拜的神明是？

表10：崇拜神明统计

	数量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无	103	22.7%	22.7%
观音	209	46.1%	68.9%
关公	62	13.7%	82.6%
佛祖	21	4.6%	87.2%
地主公	10	2.2%	89.4%
谭公	10	2.2%	89.4%
黄老仙师	9	2.0%	93.6%
天神	7	1.5%	95.1%
财神	5	1.1%	96.2%
大伯公	5	1.1%	97.4%
济公	3	0.7%	98.0%
阿弥陀佛	2	0.4%	98.5%
太上老君	2	0.4%	98.9%
泰国佛	2	0.4%	99.3%
耶稣	2	0.4%	99.8%
玉皇大帝	1	0.2%	100.0%
总计	453	100	100

由表10可知，在380名被调查者中有209名提到观音，占提到神佛总次数的46.1%。有103名表示没有经常拜的神佛，占总数的22.7%。62名被调查者提及常拜关公占提到神佛总次数的13.7%。共有观音、关公、佛祖、地主公、谭公、黄老仙师、天神、

²⁴ 受访者：戴庆义（前史里肯邦安国民中学校长，于2019年3月退休），采访者：马瑛，地点：史里肯邦安国民中学，2018年6月7日。

²⁵ 整理自笔者史里肯邦安国民中学田野调查资料。

财神、大伯公、济公、阿弥陀佛、太上老君、泰国佛、耶稣、玉皇大帝15种神佛被提及，涵盖民间信仰、佛教、道教及基督教，显示多样化特征。

新村内的庙宇加神坛共有二十多处，四所神庙均以拜观音为主，另有两间观音堂（从芎蕉园迁入）、一间佛爷庙（从芎蕉园迁入）、一间谭公庙（从椰园迁入），其它神坛主要以拜观音为主、另有一个齐天大圣神坛与天后宫神坛、还有的神坛专供道士练法术之用，基本都属道教。有一个神坛已经消失，专门拜天井神。²⁶村内有一间基督教会且历史悠久，由当时“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CIM）”现称海外基督使团（OMF）宣教士所设立，他们1951年离开中国，1952年抵达马来西亚沙登新村。1954年12月12日第一批信徒12位接受洗礼，目前信徒共有150人左右，包含居住在新村内的尼泊尔外劳十余位。²⁷

谭公庙最早建在椰园，据神庙管理人毛清华指出，由惠州人叶氏所创，庙内供奉谭公像为叶氏从中国惠州带来，建立年代已不可考。但据庙中“谭公爷爷、污秽勿近”两面红色木牌上的时间“光绪二十二年孟夏谷旦”推算，该庙最迟建立于1896年，1950年随当地居民一起迁入沙登新村。谭公是惠州客家人信仰的主要神祇，马来西亚学者刘崇汉（1999：159-213）在《西马客家人》中指出，随着客家人从中国南来到早期的马来西亚谋生，客家人的谭公庙也在这里建立起来，成为马来西亚客家人信仰文化的组成部分。

祖先崇拜的具体情况如下：

问题2：您家里祭拜祖先吗？

表11：祖先祭拜统计

选项	数量	百分比	有效	累计 百分比
			百分比	
从不	47	12.3	12.3	12.3
很少	16	4.2	4.2	16.6
有时	66	17.4	17.4	33.9
经常	251	66.1	66.1	100.0
总计	380	100.0	100.0	

表11中显示66.1%的受访者经常在家中祭拜祖先，17.4%的人有时在家中祭拜，4.2%的人表示偶尔会在家中祭拜，12.3%的人表示不在家中祭拜祖先。总体而言，在家中祭拜祖先仍是新村信仰的主流。

（二）风俗习惯

1、节日庆典

在节日庆典方面，客家村民已基本与其他华人方言群合流，据雷子健介绍：“新农村早期客家人，大年二十有拜补天穿的活动，只有惠州客才有，用糯米做的糍粑去供

²⁶ 受访者：雷子健（沙登新村文化工作者），采访者：马瑛，地点：沙登新村，2018年12月4日。

²⁷ 受访者：陈亚惹（沙登新村基督教会牧师），采访者：马瑛，地点：沙登新村基督教会，2019年12月10日。

奉，用来补天；每年农历十月初十是糍粑节，早上六点左右举行祭拜仪式，越早拜越好。正月初九拜天公，七月十四拜中元节，福建人是七月十五拜。²⁸ 2019年2月24日，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带领村民首次举办“补天穿”庆典，与村民一起以五彩石、客家糕粿、酿豆腐等祭拜女娲，为使客家文化在新村中得到传承与重振。²⁹另外，新村至今还连续举办了超过十届的中秋晚会及嘉年华活动，每年至少有上万人参与。

2、丧葬习俗

沙登新村过去的葬礼通常是由村民分工合作完成，但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现在多由棺材店转型而来的殡葬业者或其它殡葬服务公司，包办殡葬（接体、洗身、入殓、化妆和下葬等）、礼仪（礼仪、引导和接待等）、灵车等“一站式”服务。村民一般会提前联络好殡葬服务公司，选定自己所需配套，随后事宜均交于从业者打理。在丧葬仪式方面，目前主要有道教、佛教、基督教三种类型。

（1）道教仪式

道教仪式是沙登客家村民传统且普遍的丧葬仪式，一般在具民间信仰或道教信仰的村民家庭中进行，其实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道教仪式，其中还包含一些民间习俗，本文暂归于道教仪式中。仪式会请客家道士或“南无佬”³⁰来主持，往生者儿女需穿黑色衣裤，孙子穿蓝色衣裤，外孙白衣黑裤，所有家属外穿麻衣，长孙在腰间系红色带子。师傅念经的时间都在晚上七点至十一点之间，准备纸扎、金银纸、香等，贡品拜肉，一般贡三牲：鸡、猪肉、鱼。棺材以前用梅花棺木，上宽下窄，至少二十多人才能抬动，新村中由于制作师傅都往生了因此失传。现在棺木用西式四块板型，六至八人就可以抬动。仪式过程有如下几点：

- ① “买水”，给往生者净身的水需去河边买，现在去路边或有水龙头的地方“买水”，保持以前习俗。
- ② 师傅做法事和念经均使用客家话，如因病往生一般会念《药师佛经》，化解往生者生前喝的药，仪式为绕着往生者转一圈摘一片叶子放一个零钱。
- ③ 师傅用泥沙堆出龙的模型，埋一些钱币于其中，仪式结束后子孙可自己取出钱币，此仪式寓意为亡者通行地府关卡提供方便。
- ④ 需要往生者穿过的衣服来招魂，用客家话念经做招魂仪式。
- ⑤ 往生者年纪60岁以上可穿寿衣，如小于60岁穿自己准备的衣服。年龄计算为已婚男农历生日加三岁，女加四岁，如未婚所有男女加三岁。

²⁸ 受访者：雷子健（沙登新村文化工作者），采访者：马瑛，地点：沙登新村，2018年12月4日。

²⁹ 整理自互联网资料南洋商报，《欧阳捍华：传承客家文化，沙登首办补天穿庆典》，<https://www.enanyang.my/news/20190225/%E6%AC%A7%E9%98%B3%E6%8D%8D%E5%8D%8E%E4%BC%A0%E6%89%BF%E5%AE%A2%E5%AE%B6%E6%96%87%E5%8C%96br-%E6%B2%99%E7%99%BB%E9%A6%96%E5%8A%9E%E8%A1%A5%E5%A4%A9%E7%A9%BF%E5%BA%86%E5%85%B8/>，2019年2月25日。

³⁰ 南无佬：客家话，“南无”同“南无阿弥陀佛”中的“南无”，佬为师傅的意思，类似于客家道士，主持客家丧葬仪式。

⑥ 出殡日期必须参照《广经堂》³¹这本书选吉日吉时，决定做几天，什么时候出殡。

⑦ “打斋”，出殡移动棺木的时候道士或“南无佬”会先做打斋的仪式，然后“腰棺”³²，在场者用银纸沾湿来抹棺木，寓意是清洁棺木。棺木移走上车时师傅告诉在场人哪种犯冲生肖要背过身不能看。

⑧ 棺木上车后所有人跟在车后，家属不能穿鞋，以前赤脚现在穿白袜，师傅撒开路钱，不管家住新村哪里一定要经过旧巴刹大街到第11区古腰河旁曾经的新村入口为止，之后孝子跟棺木送去义山，亲朋好友就可以散了。

⑨ 以前出殡时会有敲锣打鼓的仪式，告诉其他人有人往生，现在换成了西洋乐队吹奏现代乐曲《茉莉花》、《世上只有妈妈好》、《友谊万岁》等。

⑩ 下葬时，棺木入坑后每人撒土在棺木上寓意入土为安，当下不能拍掉手上的土。下葬完后，师傅撒白米、茶叶、零钱，每人用衣服接然后带回家，寓意丰衣足食。

⑪ “脱孝”，下葬结束后回家，道士或“南无佬”念经，家属身换有颜色的衣服，穿木屐象征步步高升，现在用红包代替，一般两块令吉。经念完衣服换好仪式结束，随后一般会设平安宴。

(2) 佛教仪式

新村中丧葬选用佛教仪式近十多年才开始流行。如安排做佛教的佛理法事，一般请吉隆坡的法师来主持，大多都是中国师傅，念经使用华语，贡品为素。仪式比道教简单。往生者的停放时间百无禁忌，日子亦没有固定，一至三天都可以。如果家属没有信仰或天主教，一般也会请法师来念经，家属就在旁边不拜。出殡时没有选日子、挑犯冲生肖、撒纸钱等。家属孝衣如果简化，一般都穿白衣黑裤。³³

(3) 基督教仪式

如村民往生者是基督教信徒，丧礼一般由沙登新村基督教会牧师帮助主持，叫安息礼拜或追思礼拜，仪式更为简单。通常在晚上，会有唱诗歌、分享信息、家人分享亡者事迹、瞻仰仪容等仪式。次日出殡礼拜，包含唱诗歌、瞻仰仪容、最后献花等。基督教的丧葬仪式并不是为死者超度，主要是安慰生者。³⁴

3、婚嫁习俗

目前马来西亚的华人婚嫁习俗已经趋同，在方言群内部客家人与广府人大概一致，福建人、潮州人稍有点差异，与丧葬一样大都由专门的婚嫁行业从业者一手包办，沙登新村也不例外。二三十年前，村民婚嫁一般都在家里办，现在都选在酒家或酒店进行。至今还保留的婚嫁习俗有以下几点：

³¹ 《广经堂》是由香港堪舆学家蔡伯励所写的有关风水、堪舆的著作，一般每年都会出版，华人婚丧嫁娶选日子都会参照这本书。

³² 腰棺：客家话，意为清洁棺木。

³³ 沙登新村丧葬习俗中的道教、佛教仪式均整理自村民朱金华访谈。受访者：朱金华（沙登新村福祥发长生殡葬服务店老板），采访者：马瑛，地点：沙登新村，2019年12月10日。

³⁴ 受访者：陈亚惹（沙登新村基督教会牧师），采访者：马瑛，地点：沙登新村基督教会，2019年12月10日。

(1) “开门厨”，结婚前一晚婚嫁男女双方各自在家请客，请完客过后是“上头”，大概当晚十一或十二点，父母给新人梳头，点龙凤烛，摆贡品，三四十年前摆猪肉、鸡肉、鱿鱼³⁵，现在改用水果。口念“一梳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儿孙满堂”，梳完后父母不能睡要看着龙凤烛，确保龙烛与凤烛一同燃完，如哪支燃得比较快需放盐。

(2) 以前新郎去接新娘时，只是喝茶、拜神、接新娘，没有“玩新郎”的活动。现在玩新郎和一同接亲的兄弟，成了接亲时必不可少的内容。³⁶

(3) 婚宴一般晚上七点左右开始，十点半左右完成。以前婚宴结束回家后，新娘还要给男方父母敬“暖和茶”，现在没有了，第二天一早新娘需给家婆拿水洗脸，早上敬茶三天，现在也没有了。³⁷

(三) 饮食文化

饮食，是观察一个族群必不可少的内容，当地族群的饮食习惯与文化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该族群区分“我群”与“他群”的特征。近年来，随着沙登新村的城市化转型发展，餐饮业在新村经济中占比逐年增大，加之州政府提倡推动旅游文化产业，新村中经济餐厅、小吃档口、冷气餐厅、住家式饭店随处可见。相较周边更为便宜的物价，传统客家特色美食及其它各种多样化选择，成为吸引周边居民及部分游客在新村进餐的主要原因，同时促进新村服务业发展。

客家菜是华人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村中客家菜如同客家方言一样随处可见。村民介绍客家菜以“咸、肥、香”为特色，客家先辈来到南洋多数都做苦工，为了保持体力，在做菜时一般多放油盐，久而久之就成了特色。新村中除了典型的客家传统菜外，同时还有其它华人菜系、马来餐、印度餐、西餐等。

酿豆腐，是沙登新村客家菜里最具代表性的食物，是把新鲜的猪肉或鱼肉拌着少许虾米剁碎后当馅料，然后把馅料酿进嫩滑的豆腐块内，再以煎、炸、煲等方法来烹调。具体做法很多餐厅也有不同，如赤溪风味酿豆腐，鱼肉比例95%，猪肉只有5%，与其它酿豆腐不尽相同。（雷子健2017b: 22）客家猪脚醋，以猪脚为原料，烹煮时加姜、蒜末等，酸、辣、甜味兼具，是非常正宗的客家味道。（雷子健2017b: 26）纸包鸡是报纸刊登要沙登必吃的美食：“梁雅茶餐室的纸包鸡已经是沙登的地标之一，来到沙登不吃纸包鸡，犹如进入宝山空手归。这里的客家酿豆腐、猪脚醋、沙律排骨及客家炸肉也成了博特拉大学的学生及居民的主要选择之一。拥有40多年历史的这家店，是沙登3代人的饮食回忆。”（星洲日报，2012）彩色板面，用天然蔬菜制作，包

³⁵ 客家人拜祖先时的贡品，也称三牲，包括猪肉、鸡肉、鱿鱼。

³⁶ 玩新郎：在接亲时对新郎和前来接亲的兄弟出一些难题让他们完成，目的在于考验男方迎娶新娘的毅力和决心。具体如在水杯里放冰块需用脚夹起来，喝调制成酸甜苦辣等味道的液体等，新娘的姐妹们问问题，回答不对要给红包等。

³⁷ 受访者：李彩霞（沙登新村婚嫁从业者），采访者：马瑛，地点：沙登新村，2019年12月10日。

括白色（纯面粉原味）、青色（菠菜）、黄色（金瓜）、紫色（番薯）和橙色（灯笼椒），颇具营养价值，现在还有新口味黑色（竹炭板面）。（雷子健2017b: 40）

客家手工包，广东、福州风味的包子普遍可见，客家风味尤其梅菜包就不是到处都有，以梅菜入馅、鲜香可口。另还有花生包、豆沙包、椰丝包、豆蓉包、牛油包、叉烧包、菜包、玉米包、黑芝麻包等。（雷子健2017b: 58）婚嫁龙凤礼饼，专供婚嫁或祭祀之用，馅料一般为豆沙（红）和豆蓉（黄），一红一白为一对，上印双喜红印，是传统客家婚礼必备的喜饼。供祭祀之用的礼饼稍大，花纹更多。客家茶粿，是新村人日常食用的糕点，由糯米粉、食用油、水等原料制成，馅料有红豆沙、绿豆沙、椰丝、芋头等。客家糍粑，是传统的米食甜点，以糯米粉为原料，煮熟后包入花生碎和白糖为馅，节庆时也常用来充当祭品。

六、结语

本文结合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从区域及新村概况、居住形式与房屋、社会组织与教育、信仰风俗与饮食四个方面对史里肯邦安客家新村概况展开调查，梳理地理位置、新村历史、族群构成与职业等方面的特征。随着马来西亚社会的不断发展，当代社会分工、组织关系已然改变，以祖籍地或方言群为纽带的族群边界逐渐模糊，马来西亚华人各个方言群间的信仰互相融合、走向趋同，史里肯邦安（沙登）新村的发展正是马来西亚国家城市化进程的缩影，由于新村特殊的土地、政府管理政策等，使得沙登新村并没有同周边区域一样完全城市化，而形成了类似于“城中村”的居住形式，既位于城市又相对封闭，既以客家族群认同为主又逐渐走向族群认同内涵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 Corry, W. C. S. 1954. A General survey of new village: *A report to his excellent sir Danald McGillivray, high commissioner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inters, by G.A.Smith). [Achieve File No.:2006/0007909W(File B/C 487/55)]
- 邓伟秀, 2008a, 〈居民靠鞋业养家〉，《南洋商报》，2008年12月18日。
- 邓伟秀, 2008b, 〈苟延残喘夕阳行业〉，《南洋商报》，2008年12月21日。
- Edgeprop, 《重点报道: Seri Kembangan 琢磨蜕变中》，<https://www.edgeprop.my/content/1416415-重点报道: seri-kembangan-琢磨蜕变中>, 2018年8月23。
- 冯自由, 1946, “华侨革命开国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华侨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6页。
- 郭秋香, 2012a, 〈取名源自“沙登”树木〉，《星洲日报》，2012年7月5日第1版。
- 郭秋香, 2012b, 〈土质好杨桃鲜甜〉，《星洲日报》，2012年7月22日。
- Google 地图,
<https://www.google.com.my/maps/place/Seri+Kembangan,+Selangor/@3.0089644,101.6506229,13839m/data=!3m1!1e3!4m5!3m4!1s0x31cdb55f1721e103:0x682c9d5e1c509291!8m2!3d3.021998!4d101.7055411?hl=en>, 2018年2月1日浏览。
- 黄宏英, 〈生老病死食住行 雪州政府都照顾〉，《爱沙登社区报》，2017年仲夏号，第6版，页7。

- 何欣瑜，〈老沙登变身斯里肯邦安〉，《光明日报》，2011年4月6日第1版。
- 赖征涛，〈沙登惠州双城记 客家姐妹喜相逢〉，《爱沙登社区报》，2010年元旦特号，第4-5版，页4-5。
- 刘崇汉，1999，〈西马客家人〉，赖观福主编：《客家源远流长—第5届客家研讨会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
- 刘丽川，2013，〈中国大陆客民信仰与大马客民信仰之异同〉，《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加影：新纪元学院，第2卷第2期。
- 林廷辉、方天养，2005，《马来西亚新村迈向新旅程》，吉隆坡：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页48。
- 雷子健，2012，《爱新村——雪州华人新村的美丽与哀愁》，雪兰莪：雪州政府新村发展委员会，页21。
- 雷子健，2017a〈沙登新村中文路牌 逐渐更换保留旧称〉，《爱沙登社区报》，2017年仲夏号，第5版，第5页。
- 雷子健，2017b，《寻味沙登》，雪兰莪，沙登社区服务中心。
- 民汉俱乐部，2009，《把根留住——民汉俱乐部成立72周年志庆》，雪兰莪：民汉俱乐部。
- 〈欧阳捍华：传承客家文化，沙登首办补天穿庆典〉，《南洋商报》电子报，[http://www.serdangbaru1.edu.my/2010/05/blog-post_21.html](https://www.enanyang.my/news/20190225/%E6%AC%A7%E9%98%B3%E6%8D%8D%E5%8D%8E%E4%BC%A0%E6%89%BF%E5%AE%A2%E5%AE%B6%E6%96%87%E5%8C%96br-%E6%B2%99%E7%99%BB%E9%A6%96%E5%8A%9E%E8%A1%A5%E5%A4%A9%E7%A9%BF%E5%BA%86%E5%85%B8/，2019年2月25日。</p><p>Pang Hooi Eng. 2000.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Lee Kam Hing and Tan Chee-beng, eds, <i>The Chinese in Malaysia</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Robert V. Krejcie & Daryle W. Morgan. 1970. Determining Sample Size for Research Activities. <i>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i>, pp. 607-610.</p><p>沙登新村国民型华文小学一校官方网站，沙一简史，<a href=)，2019年1月2日。
- 沙登新村国民型华文小学二校官方网站，学校简史，http://www.serdangbaru2.edu.my/hom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layout=blog&id=43&Itemid=39，2019年1月4日。
- 徐威雄，2013，〈革命的外围组织——俱乐部初论〉，《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论文集》，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星洲日报》，〈到沙登要吃纸包鸡〉，2012年7月29日。
- 曾秉钧，〈首次文艺复兴 人民党播种子〉，《爱沙登社区报》，2010年劳动节号，页11。
- 曾秉钧，〈曾经杨桃结满山 如今满山见楼盘〉，《爱沙登社区报》，2013年春节号，第3期，页11。